史 学 研 究

北京大学档案与聘请季羡林任教的时间问题

王 邦 维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　要: 北京大学的校史档案中,有一份联大时期“昆明办事处”的文件,内容是当时聘请教员的名单,名单中包括季羡林。文件末尾有月日而无年份。在 1998 年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中,这份文件排列在昆明办事处 1942 年与更早时间在昆明签发的几份文件之间,这不免让人生出疑问,难道北京大学聘请季羡林任教之事也是在 1942 年吗? 文章分析此事不可能,进而得出结论:北京大学的昆明办事处在北大回到北平后仍然运作了一段时间,上列的第 2、第 3 两份文件虽然属于昆明办事处,但实际是 1946 年 6 月和 5 月在北平签发,与此事有关的人有当时参与其事的汤用彤、郑天挺和傅斯年等。

关键词: 北京大学校史;北京大学昆明办事处;季羡林;汤用彤;东方学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K 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8)06-0116-04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是有关西南联大历史的资料汇编,其中主要的部分,来自三校的原始档案。全书六册,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以及云南师范大学共同编辑而成,出版于 1998 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时。其中第一册的第三部分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组织”,其下第五项是“三校办事处”,首先列出的是“国立北京大学昆明办事处”的四份文件。第 1 份文件是“国立北京大学昆明办事处机构人员名单(1942 年)”。第 2 份文件是“国立北京大学昆明办事处致函郑天挺开列已聘教员 36 位的名单”,内容如下:

> 毅生先生:
>
> 下列叁拾陆位教员之聘请,得系主任院长之同意,并禀报告校长,现已将聘函发出,敬祈查核为荷,顺颂
>
> 道祺
>
> 国立北京大学昆明办事处启
>
> 六月七日

以下是一份拟聘教员的名单,名单中当时或后来比较有名的教员有:第 2 名贝时璋,拟聘教授;第 20 名钱思亮,拟聘教授;第 21 名徐震谔,拟聘教授;第 28 名许德珩,拟聘教授;第 32 名沈从文,拟聘教授;最末一名是季羡林,拟聘副教授。

第 3 份文件是“汤用彤致郑天挺:谈北大昆明办事处决定发聘函办法”。汤信末尾也有日期,是“五月七日”。

第 4 份文件则是“国立北京大学昆明办事处教务会议(第一至第四次)”的会议纪要,每份纪要都有明确的时间,分别是“廿七年七月廿六日”“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四时”“二十八年九月廿三日下午四时”“卅一年七月廿九日下午六时半”,即 1938、1939 和 1941 年,同时还有几次开会的地点,都在昆明。①

这几份文件,现在都保存在北京大学档案馆,文件来自当年的北京大学昆明办事处没有问题。现在的一个问题是:文件既然属于北京大学昆明办事处,它们都是在昆明签发的吗?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问题:其中的第 2 和第 3 份文件,日期上仅仅标示了月和日,作为档案,一般都依照时间次序

收稿日期:2018 - 09 - 15

作者简介:王邦维,男,重庆人,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项目编号:14 ZDB084)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6—123 页。

排列,这两份文件放在有年份标识的第 1 份文件之后,同样也有年份同时还有地点标识的第 4 份文件之前,它们是不是也是在 1942 年,也就是北大的昆明时代在昆明签发的呢? 现在这样的情形,给人的似乎就是这个印象。①

但如果做认真的考证,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拟聘教员中的季羡林先生到北大任教,是在 1946 年。“北京大学昆明办事处启”后落款的“六月七日”,只可能是 1946 年的 6 月 7 日,而不可能是 1942 年 6 月 7 日。汤用彤先生致郑天挺先生信末尾的“五月七日”,同样也是 1946 年的 5 月 7 日。1942 年季羡林先生还在德国,而且这时正是中国和欧洲战争最激烈的关头,以各方面的情势推断,这个时候北大还在云南,完全没有可能聘请季羡林先生来校任职。

与此相关,还有另外更直接的证据。新近出版的两种《季羡林日记》,也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北京大学聘任的事。季羡林先生在 1946 年 1 月 23 日的日记中写道:

> 写给汤用彤先生一封信,因为陈寅恪先生写信告诉我说北大想设东方语言系,让我把学历著作寄去。

季先生写这段日记时,是在瑞士的伯尔尼,正是他从德国返回中国的途中。这封信寄出是在两天以后,1 月 25 日的日记:

> 早晨七点多才起来,吃过早点,把写给汤锡予(汤用彤)先生的信抄好。……吃过午饭,回来写给陈寅恪先生一封信。……五点到邮局把给陈汤两位先生的信寄走。②

季羡林先生 1935 年 9 月到达德国留学,因为战争的原因,在德国一直停留到 1945 年 10 月。1945 年 5 月,欧洲的战争结束,终于有了回国的可能,但一旦回到中国,对他来说,最要紧的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教职。为此他给他在清华大学时的老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写信,表达了这样的愿望。陈寅恪先生很及时地打听了情况,并与北大做了联络。接到陈先生的信,季先生在国内寻求教职的事才有了明确的方向。季先生这时的状况,与大多数归国或准备归国的留学生经历都差不多。

1946 年 2 月 2 日,季羡林先生从瑞士到达法国里昂,再到达马赛。2 月 10 日,季先生搭乘的船从马赛开出。3 月 1 日,船经过新加坡。3 月 6 日,船到达越南的西贡。季先生在西贡停留了 40 来天,4 月 19 日,重新上船,其后或是没作日记,或是日记缺失,总之,5 月 1 日的日记记载,已经是在香港了。其后的日记又有六天的缺失。5 月 19 日的日记记载,已经到达上海。5 月 24 日,就在停留上海的期间,季先生的日记写道:

> 虎文回来,带了一大批信,居然有叔父他老人家的,我真是大喜过望。同时汤用彤先生通知,我已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教授,可谓双喜。

这批信中,包括有汤用彤先生的信,信中告诉他北大决定聘用的消息。从 1 月 25 日从瑞士寄出给汤用彤和陈寅恪先生的信,表达希望到北大任教的意愿,不过四个月的时间,就有了这样的结果,季羡林先生怎么能不欢喜而溢于言表? 这样欢喜的情绪,延伸到第二天。5 月 25 日的日记讲“早晨五点半就起来了,外面又是无比的好天。写给汤用彤先生一封信”。显然是向汤先生报告,信收到了。只是这时还没有收到正式的聘书。

1946 年 6 月 3 日,季羡林先生从上海到达南京。6 月 19 日,季先生停留在南京,当天的日记中讲:

> 正在闲谈的时候,忽然收到北大寄来的临时聘书。③

对比上面讲到的北京大学的 4 份档案中的第 2 份文件,季羡林先生收到聘书的时间,正好是在“昆

---

① 此即本文撰写的起因。今年 5 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教授访问北大。罗梅君教授是北大的老校友,近年来研究中德文化教育交流的历史,也关心北大的校史,她跟我说,她发现北大 1942 年的档案文件有记录,当时就准备聘请季羡林到校任教。罗梅君说的记录,指的就是这里所讨论的第 2 份文件。我表示怀疑。本文的写作,即为弄清楚这一问题。

② 《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第六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892 页。

③ 《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3、32 页。

明办事处”确认寄出聘书后的第 12 天。有了聘书,季先生彻底放心了。第二天,6 月 20 日的上午九点半,季先生去看陈寅恪先生,估计他是想在第一时间向陈先生报告这个好消息。

6 月 25 日上午一早,吃过早饭,季先生又去了南京的中央研究院,见傅斯年先生。这显然也是因为收到了聘书,需要向傅斯年报告。不过,季先生在日记中讲,他与傅斯年的谈话似乎不是太热烈。傅斯年“说话有点不着边际,谈了谈北大的情形,我觉得他们没有诚意聘我,他们当然高兴我去,不过没有我也行”。①季先生这样说,恐怕只能说是他的一个误会。或者说季先生当时还比较年轻,过于敏感。与陈寅恪先生不一样,傅斯年此前个人与季先生并无交往,以傅斯年众所周知的性格,傅在学术界的资历和地位,他当时的北大代校长的身份,他与季先生见面,谈话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没什么奇怪。设想在今天的大学,一位即将入职但还未入职的教员,即使有机会得到校长的接见,第一次见面和谈话,也未必一定很亲近。

上面所有的证据,说明的只有一点,季羡林先生到北大求职和任职,都是发生在 1946 年的事情。所以,北大档案中的第 2 份文件上签署的 6 月 7 日,确定无疑的是 1946 年的 6 月 7 日,而不是在其他年份。

四份文件中第 3 份文件,也就是汤用彤先生的信,与这件事也直接相关。信的内容如下:

毅生兄长:

傅公所寄来聘函稿,已油印(印得不好,系油墨的关系),奉上一份,字句改动,后附三条,不合此间接洽情形即已定办法,只能大加修改。乞交校长一阅。此间决定发聘函办法:

① 新聘者全发,例如胡世华。

② 旧人离校续聘者亦发,例如朱光潜、罗莘田。

③ 现在在校续聘者不发,例如你、我。

又此项聘函,仅用于教授、副教授。用于讲师语气已不合,用于助教则更不妥。弟等之意,讲师、助教可等以后发聘书。

昨日三校联合招生委员会决议,北平、天津亦联合招生。北平招生办事处主任暂请兄担任,但知兄忙,已言明,请兄另请一位担任(弟意烦廉澄兄,烦请示傅公),决定请示知为荷。

顷得纽约胡先生电“五月廿七日动身”。此闻皆大欢喜也。

此上即颂

道祺

弟 彤

五月七日

看了这封信,情况就更清楚了。信中所讨论的事情发生的地点,显然已经不是昆明,而是北平,而且时间不是 1942 年,而是 1946 年。“傅公”即傅斯年,这个时候校长胡适尚未从美返回,傅斯年先生担任代校长,对校务做最后的决定,正是傅斯年的责任。昆明办事处呈送郑天挺的报告与汤用彤致郑天挺的这封信,谈的是一件事,后者落款时间 5 月 7 日,前者 6 月 7 日,刚好相差一个月,后者在前,前者在后。因此正确的排列方法应该是把这封信放置在“昆明办事处”给郑天挺开列的“已聘教员 36 位名单”的前面。

以上涉及的情况,其间的一些细节,其实也值得注意。这包括几点:

一、抗战胜利,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各自迁回原址。北京大学迁回北平后的一段时间内,学校的校务办公机构仍然是以昆明办事处的名义在工作。当然,这是因为当时的情况特殊。昆明办事处最后撤销,应该是在胡适校长到任,即 1946 年的 8 月以后的事,原始的档案显示,这时北大校一级的办事机构已经改称为“国立北京大学总办事处”。② 改名具体是什么时间则有待考证。

二、依汤用彤先生致郑天挺先生的信,1946 年的 5 月 6 日,三校联合招生委员会开会决议,当年的招生,仍然依在昆明的做法,合在一起进行。这是三校回到北方以后的首次招生,事情也很重要。

三、汤用彤先生写信时,似乎不仅仅是文学院院长,信中所讲的事,超出文学院院长的职责

① 《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第 35 页。

② 此依北京大学档案馆收藏的 1948 年《北京大学在校教职员名单》(档案号 MC1948. 1)上所印的抬头。胡适到职时间是在 1946 年的 8 月。

范围。

四、北京大学聘请季羡林先生到校任教,最早提出建议的是陈寅恪,得到当时的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最直接的支持,其间联络最多的也是汤用彤,具体处理此事的则有汤用彤和郑天挺,最后由代校长傅斯年认可和批准,但与胡适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季羡林先生 1946 年 6 月 19 日收到北大的聘书,9 月 21 日到北大报到,22 日一天,先后拜见汤用彤和傅斯年先生,23 日就拜见胡适先生。这个时候胡适刚刚到任,此后季羡林作为新成立的东方语文学系的系主任,与胡适的交往就很多了,直到 1948 年 12 月 15 日胡适离开北平,也就是最后离开北大。这些在季羡林先生的日记中都有记载。①

以上的讨论,都与北京大学的校史有关,虽是细节,对了解当年北大回迁北平后校内管理运作的情况以及聘任教员的程序仍然不无意义。同时这也说明,即使是档案,使用时往往也需要做仔细的考察,尤其是档案的背景。如果是经过整理和编排的档案,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更是如此。

至于北京大学当时组建东方语文学系并聘请季羡林先生到校任教一事,涉及北大历史上的学科建设和院系设置的历史,其中更有一些值得谈论的话题,可以留待以后再谈。

The Archives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e Date of the Job Offer for Ji Xianlin

Wang Bangwei

(*Research Center for Eastern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archives of Peking University, there is a document issued by its Kunming Office (昆明办事处) which wa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西南联大). Its content is a name list of recruited faculty members including Ji Xianlin (季羡林). It has no date of issue but is arranged between another document dated 1942 and some others dated even earlier. Thus it may raise a question: Was Ji recruited as Professor by Peking University in 1942? Through careful investigation, we find out that the answer is No. Though the document really belongs to the Kunming Office of Peking University, it was not issued in Kunming but at Peking University's campus in Peiping (北平) in 1946. The people concerned also included Tang Yongtong (汤用彤), Zheng Tianting (郑天挺) and Fu Sinian (傅斯年).

Key words: History of Peking University, Kunming Office of Peking University, Ji Xianlin (季羡林), Tang Yongtong (汤用彤), academic history of orientalism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第 80、81 页。